

陕甘宁边区民众的社会意识觉醒与心理嬗变

杨 东

(天津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134)

摘 要: 长期以来由于乡村民众自我认同的缺失, 致使乡村社会一直处在那种波澜不惊的既往秩序之中。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却是另一番景象, 个中缘由既有当初社会环境的影响, 同时也是边区民众自我意识认知的转变与升华的结果。边区开展以“吴满有运动”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奖励大会, 不仅塑造了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认知, 而且使得这种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转变与升华, 又从根本上促成了民众生活方式的觉醒与嬗变。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乡村民众; 自我意识; 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0)01-0022-04

On The Awakening of Social-consciousness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Rural People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YANG Dong

(The College of Marxism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It has long been that the rural population lacked of self-identit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rural community has been subdued in the fixed order. However, rural society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s entirely different story. There were some reason that not only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ve changes. Border Region carried out "Wu Man you movement" for awarding the labor hero, not only created the rural people's cognitive self-consciousness and which caused it further sublimation. At last, it led to changes and awakening of fundamental way of life.

Key words: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rural population; self-consciousness; way of life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由于每一种身份和地位几乎都被一套预定的行为模式、义务和特权所规范着, 都分属于这个社会尊卑有等、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社会位置, 所以对于乡村民众而言也概莫能外, 由此也就导致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处在那种波澜不惊的既往秩序之中。但是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却以一片生机勃勃的情景, 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幅漫画。以往对此问题的论述大都偏重于宏大的叙事模式, 似乎较少关注乡村民众本身的感悟。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乡村民众自我意识认知的角度来解读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认知

在中国社会文化中, 再没有像农民这样有如此多的称谓: 布衣、氓、生民、黎民、黎庶、黎元、庶民、苍生、蚁民、牛马等等。这些不同称谓让人们“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隔有一道高墙, 将各个分离”, 即便“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 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 并且, 变本加厉, 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 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1] (P77)}可以说长期以来形成的尊卑秩序观念, 已深深地印刻在民众脑海里, 其结果便是模糊了自我认同, 只能以上天注定的宿命论姑且

收稿日期: 2009-11-12

基金项目: 天津商业大学青年科研培育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编号: 071120)的最终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东(1978-)男, 陕西府谷人, 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史研究。

解脱。而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由于政治、经济等新的因素的激荡与冲刷,人们的固有思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陕甘宁边区开展以“吴满有运动”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奖励大会,无疑对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始宣传奖励劳动模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到1942年边区就出现了以吴满有为代表的众多劳动英雄。吴满有在过去曾是一个难民,后来辗转到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起初因极度贫困曾卖过女儿,后在土地革命时期分得土地。由于勤劳,再加之他有计划地安排农事,成为边区开荒地最多、增加粮食最多的农民。同时他还领导了吴家枣园的全村变工,使得吴家枣园成为劳动模范村。由于其突出的成绩,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为特级劳动英雄,并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43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号召。文章指出:“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2]

曾经是一个逃荒卖女的破产农民吴满有,结果凭借自己的勤劳,可以与领袖的照片并排摆放,对于民众来讲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很明显,在民众眼中,“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3] (p66)}这种从未有过的现象,反映在民众心头的显然就是劳动不再下贱,几千年来挖土工作受到鄙视的人们,现在却得到了尊敬和荣光。事实上,其重要性还远不至于这一点。一旦把劳动和光荣联结起来,把劳动与英雄相提并论,劳动英雄便成为民众争相比照的对象。于是便会出现这种现象:只要劳动英雄做什么,周围的人就跟着做什么。举凡办义仓,办合作社,办学校,办识字班,办黑板报,发动妇女纺线……只要劳动英雄号召得好,马上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很明显,劳动英雄已发展成为群众的领袖,因此“假若吴满有把他的名字和某些新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并且在他的田地里试种,农民就更乐于接受,他是教育运动后面的推动力量之一,他虽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却要把本村学校变成其他学校的模范。”^{[4] (p76)}

当劳动也可以成为英雄,也能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奖励,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抓大烟、耍赌博的“二流子”,便成为众所厌恶的头衔。在当时召开英雄大会时,延安市政府曾找了五个二流子参加旁听,大会上对于这五个二流子与劳动英雄一样招待,献旗,请酒,开晚会等,他们都一样地去参加,起先这五个二流子以为政府要骗他们去生产,但经过了会议,看到了劳动英雄们的荣耀,受到了劳动英雄们的教育,他们感动了,在劳动英雄面前,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在大会上,他们自动宣布:“如果不再改正,就不算是个活人了”。^{[5] (p96)}这部分二流子在耳闻目睹这些新鲜事之后,经

过思想教育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年曾战斗于此的马文瑞指出,经过对这些二流子的改造,“不但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成为新人,而且在社会上普遍形成‘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风尚”。^{[6] (p45-46)}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这种变化,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乡村民众自身的内心体验和感悟,因为大凡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总会在民众内心深处有所折射,因为“社会生活尽管与有形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本身不能归属于物理现象,因为其内在本质——即那些制约社会现象的特征——是根本不可能被感官感知的,是无形的;只能通过某种内心体验被认识”。^{[7] (p77)}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心体验,奠定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认知基础。而一旦这种自我认知凝炼成被乡村民众广泛接受的社会意识,便会在社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对于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而言,近距离的接触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乡村民众社会意识的升华

长期以来有关中国人对政治冷漠的认识,几乎是中外观察家众口一词的结论。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描述的就是中国几千年农耕经济下的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论述表明: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政治距离民众确实遥远。

事实上,关于描绘黄土高原赤地千里的文字频频见诸于报端。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此凄惨的景象,在陕北这个历史上曾屡竖义旗的地方,应该是早已揭竿而起,但是当初在陕北进行活动的一些先进分子却碰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村镇每有群众聚集之处,见学生来讲演,便渐渐解散”,即便是在绥德这样号称陕北闹市、人群集中的地方,“除每年有数的大会外,每周同学讲演,几乎招不到二三十人的听讲。并非讲者招不起人的注意,这实在因为人少的原因”。^{[8] (p6)}即便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漠视政治的社会意识依然存在。尽管他们也分得土地,但他们“对于各种同生产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如参加政府与党的工作,学习文化与政治,参加会议等,他们的兴趣与积极性大大减弱了。‘顾不上’,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他们怕‘误工’,妨碍他们的生产。特别在农忙时,他们总是找出许多理由,不参加这类活动。有一部分党员,甚至发展到要求‘退党’,说:‘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9]然而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不久,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另一幅画面: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延河两岸与田间地头,到处都能听到欢歌笑语。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乡村民众自身的心态演变观之,则是来源于他们内心的真实体验。劳动的权利,应该是普天之下作为农民阶层最基本的权利。而在那些劳动者甚至对于该耕种什么都不能自主决定的日子里,权利对于他们而言确属奢侈。但是当劳动作为“解放群众的内涵的精力,复活他们的创造力”,^{[10] (p98)}使其成为英雄并被人们广泛赞誉,并最终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人们方知原来劳动竟

是如此崇高。所以当生产劳动不再成为束缚民众的枷锁,并和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政治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在此情形之下,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便自然得到了升华。

边区的报纸期刊接二连三地刊登乡村民众的身影与消息,这是乡村民众从未有过的真实体验,可以说“报纸小册子好比球场上的啦啦队,提高嗓子,向劳动英雄不断喝彩。每天《解放日报》第二版上所披露的,十有八九是生产消息,什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什么人开荒多少,打破记录;哪一家的婆姨每天纺纱几两;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生产工作进行得怎样。所有这些消息,跟着一阵喝彩的声音,送到穷乡僻角去。于是有人向某人‘看齐’了,有人向某人‘挑战’了”。^{[11] (p6-47)}民众感觉他们距离这个社会是如此之近,这是从未有过的感受。特别是劳动合作社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民众自身的需求,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过去对劳动的态度。他们认识了今天的劳动不是像从前一样,只是替剥削者造幸福,而自己却劳而无获。正是如此,他们更认识了要保障已得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国家”。^{[12] (p65)}因此可以说合作组织“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新转变和新纪元。农民由于组织起来成为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就大大地节省了人力、畜力和工具,就在合作社内部和外部掀起生产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时间并有兴趣集思广益地改进生产技术;最后,就不仅改变农民的生产关系,而且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改进他们的文化生活”。^{[13] (p40)}

于是在陕甘宁边区,“队伍里、乡村里、城市里、机关里、男女老幼,讲的是抗日话,做的是抗日事,大家都晓得大祸临头”,^{[14] (p)}所以积极支持抗战就成为他们评价好坏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与取向,即便是对于“穿国民党军官服的人,虽然似乎有点隔膜,但还是很友好的,还给我们讲全国人民应该团结抗日的道理”。^{[15] (p31)}许多抗日家属和贫农本来照例应当免税,但他们都自动地送粮食捐给政府。更有许多农民自动超过规定标准而缴纳公粮。张国焘曾回忆说:“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感召之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16] (p98)}如果有顽固分子蓄意破坏,民众的立场就是“要坚决的帮助八路军,帮助咱们的政府,把那些混蛋东西,打得抱头鼠窜。……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不能保护咱们这块自由、幸福的地方”!^[17]这种社会认知取向甚至体现在他们过年贴的对联里。如:“拥护蒋委员长,实行建国纲领”,“打日本为子为孙,除倭寇救国救民”;有的横批是“抗战救国”。有的甚至写“过年敌机又来了,惊的同志东西跑”。^{[18] (p077)}

曾经是荒凉贫瘠、保守落后的黄土地,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和感受。长期以来乡村民众存在的那种对政治的疏离感,终于在劳动与抗战的激荡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洗礼与升华。而随着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升华,又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

生活方式。

三、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又直接促成了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此前那种消极的社会心理,正在被积极的社会生活态度所取代。可以说这种新的社会心理,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陕甘宁边区作为当初中国的一个模范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首先就体现在这种心理变化上。

从政治领域来看,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民众不在游离于决策之外,而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特别是体现在民主选举方面,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伴随着民众自我意识的不断升华,先前对政治的冷淡与隔膜被一扫而光,因为在每个人心中都存有这样的认识:政府已经是“我们的政府”,红军已是“我们的红军”。当所有的这些已成为民众日常交流中的真实表达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在民主选举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对于选举什么人的问题,民众更是非常地关心与慎重,即便是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农村妇女在参加选举的时候,“都像出门做客一样梳头洗脸,穿上新衣服,绥德延家岔村的女选民,和男子一样争着提候选人。关中马栏市许多老年妇女冒着大雨,骑着毛驴,从几十里路赶来投票”。^[19]由此不难看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无疑已成为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曾经是荒凉贫瘠、保守落后的黄土地,在此时却在行使着当初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

从社会生产方面来看,劳动再也不是一种卑贱的工作,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劳动竞赛,所有这些成为边区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连道士、瞎子、老妇人也转入生产的浪潮。淳耀高湾区大香山金刚庙有一个道士张凤鸣,去春受群众开荒热潮的影响,断然剃去头发,拒绝老师阻止,搬到莲花洞务农。庆阳三十里铺有一个 57 岁的瞎子,开荒期间不甘落后,就叫他的孙子牵往地里,终于开了 4 亩 5 分荒。志丹妇女劳动英雄胡老婆,去秋收割时,鸡叫二次就起床,跑到各家门口喊叫大家快起来,鸡叫三次收拾起身,天刚亮就到了地里,使全村庄稼很快割完”。此情此景,当时的林伯渠不无感慨地说:“像这样看来很平凡而实际上包含着巨大意义的故事,从历史上,从别处,你们也能找得着很多的吗?”^{[20] (p37)}

从社会关系来看,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从而形成了“用一种新的关系来代替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21] (p30)}边区群众面对实际情况,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变工”、“搭庄稼”、“扎工”、“唐将班子”等互助合作形式,特别是在面临灾荒之时,边区各地就普遍建立义仓。志丹县五区部分村庄甚至发展到集体存粮备荒,就连“二流子

薛炳华也存了糜子一大斗,所存粮食够全村人渡三四个月的荒年”。^[22]除了创办义仓之外,群众还创办粮食信用合作社,规定每人可存粮一斗到五斗,每年由合作社付给三分利息,平时除红利可取一部分外,其余须至灾荒到来时才能领取。此外,边区群众还发展了其他的一些互助形式,如干部、劳动英雄、积极分子、进步人士开展借粮措施,利用亲朋好友关系实施借贷等各种措施。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乡村民众的新型的生活方式。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陈腐观念在这里没有了市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益密切,人们都在适应现存的制度,把自己融入其中。

从价值评判来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抗日救国,不仅仅是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更是评价爱国与否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如此,在边区的市镇和村庄,“劳动的呼声波动了整个边区,人民和军队,从乡村和城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卷入了劳动战场”。^[23]在这种情况下,“二流子”成为民众所厌恶的头衔,“劳动光荣、懒惰可耻”成为乡村民众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人们的道德观念及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凡是积极从事抗日和生产的,都受到称赞和表扬,可以说抗日和生产已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尺,什么对社会有益,什么对社会有害,人们都会做出明确的回答。

此外,由于自我认知的强化与社会心态的转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陕甘宁边区,各种剧团纷纷下乡巡回演出,歌声笑声洒满了整个边区。“他们爱笑、爱唱,听不到歌声是难得的。在星期日和假日,学生和老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24] (p40)}如果民众“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伸长了头颈等待着。他们是饿狼似地渴望着,鼓舞着。台上的戏演到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观众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爆裂一样地喊出洪亮的口号,附和地唱出激动的歌声”。^[25]另外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无疑也是群众最喜欢的另一个文化大餐,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扭秧歌更是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日常生活方式的嬗变,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外人士热衷的一个话题。难怪有人不无疑惑地说:“陕甘宁不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也不是抗日期间建立的共产党的根据地的缩影。它几乎是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一幅漫画,在许多方面体现着生机勃勃而且属于主导地位的都会文化和陷于长期压迫和无望的偏远农村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26] (p122)}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

识认知的转变与升华,既是在客观的社会政策条件下的一种变化,更是在自身切身感悟后的实际行动。对于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创建新农村的大潮中,我们似乎也应该从中总结一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 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7
- [2] 开展吴满有运动[N].解放日报,1943—1—11.
- [3]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66
- [4]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76
- [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卷)[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696
- [6] 马文瑞文选(第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455~456
- [7] 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7
- [8] 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内部资料)[Z].1991.16
- [9]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84
- [10] 谢觉哉日记(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98
- [11] 任宏,高梅.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46~47.
- [12] 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65.
- [13] 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40
- [14] 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二辑)[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5
- [15]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内部资料)[Z].1991.31
- [1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98.
- [17] 关中民众热烈动员,赶送公粮,积极参加自卫军、运输队,保卫家乡[N].解放日报,1945—12—29.
- [18]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M].北极书局,1940.307
- [19] 陕甘宁边区的普选运动[N].解放日报,1945—12—29
- [20] 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37
- [21] 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230
- [22] 实行集体存粮备荒[N].解放日报,1945—6—27
- [23] 阿光.来到延安之后[N].解放日报,1943—9—3.
- [2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0
- [25] 雷铁鸣.戏剧运动在陕北[J].解放周刊,1937.(1).
- [26]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2

(中华 编发)